

勤政担当 惠泽民生

不论在何时,岁稔年丰、安居乐业都是普通百姓最真切的渴望。

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,在三亚漫长的历史中,众多驻守此地的官吏用自己的方式,帮助百姓实现这一期盼。

南宋年间,毛奎来到崖州任知军。彼时的崖州城,地荒人稀,河流难济农耕之需。百姓要吃饱肚子,作物要生长,便离不开水。但水利牵扯方面多,耗资耗力且需通盘谋划,绝非易事。

这位“能文章,通术数,知地理”的实干家,以非凡魄力对绕城而过的宁远河进行改造。

明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,毛奎“压之”宁远河,使其“水路随塞为平地,反流城北数里入海”,一条新的支流“后河”由此诞生,为崖州百姓开辟出赖以生存的沃土。

这是崖州乃至琼南第一个规模性治水工程,以人力改天换地,尽显实干担当。

数百年后,清代知州钟元棣继往开来,将目光投向农桑振兴与赋税纾困,从“保生存”转为“谋发展”。

光绪《崖州志》记载,钟元棣“勤政爱民,捐廉倡事”,积极倡导“劝农课桑”,推广种桑养蚕之法,设立机房收购蚕丝,指导百姓拓展农产增收路径,让地方农桑产业日渐兴旺。

考虑到百姓赋税繁杂、负担沉重,钟元棣又推行丈地清赋之策,简化征收流程,裁汰额外浮费、免除不当升科,切实剔除苛捐杂税,让农者得其利、劳者有所获,深受崖州百姓感念。

有人深耕日常,也有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,生动诠释了“父母官”三字的含义。

清朝雍正三年(1725年),安徽歙县人程哲在崖州任知州。那年五月,崖州地震。七月又震。震后天旱,兼蝗虫食禾,米价腾贵,“斗米一金,民多饿死”。

为了掌握震情旱象,他自备夫马,亲自到州西一百多里外的村落考察。随后具文禀请上级:由海船运谷三百二十担,直送旱区赈济饥民;另开官仓拨大米二百五十担,专运震区抚恤困厄百姓。

“民得聊生。州人勒碑称颂。”短短的十个字里,是百姓的肺腑之情与深切拥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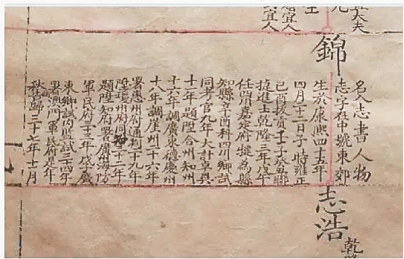
若把历史比作奔涌的长河,鉴真、黄道婆、钟芳等名垂青史者,似大涛大浪,以轰轰烈烈的事迹激荡起时代潮声。

而长河之所以浩荡不绝,从来离不开万千溪流的默默汇聚——三亚的历史长卷里,亦有诸多默默耕耘的名吏。他们或许未曾留下煊赫声名,却以躬身实干造福一方百姓,于平凡处坚守初心,于细微处践行使命,点燃文化的薪火,滋养这片土地的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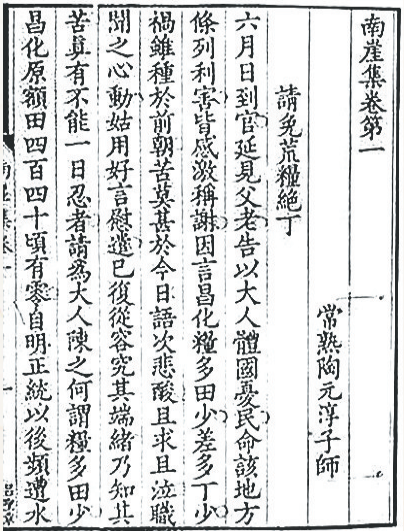
功成不必在我,功成必定有我。历史的洪流一往无前,那些隐于岁月尘埃、却始终心系苍生的身影,值得被深深铭记,永载这片热土的记忆之中。

崖州清风 千载回响  
三亚名吏: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梦楠



古籍中的《宋锦传》。资料图



陶元淳文集《南崖集》书影,此书开篇即是陶元淳请求官府免除受灾百姓粮赋的上书,体现了陶元淳关心民瘼、为民请命的精神。

资料图



俯瞰三亚宁远河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

初心不改 清廉公正

在中国的官吏中,包公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古往至今,百姓蒙冤常盼“青天大老爷”,一句“包公转世”,更是对良吏的最高褒奖。

在崖州,就有一位“包公”,民间素有“虽有余虎,但不敢陶公一怒”的传言,他就是陶元淳。

陶元淳在崖州为官时,守备黄镇中以非刑杀人,游击将军余虎却纵容不管,这让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陶元淳得知他们的恶行劣迹,十分愤慨,将实情呈报上官。此时,余虎以百金贿赂遭到斥责,又尝试贿赂总督、造蜚语以诬陷陶元淳。

面对权势胁迫,陶元淳毫不退缩,果断拘捕黄镇中人狱审问。庭审时,黄镇中竟指使百名披甲带刀的兵士闯入公堂劫持,陶元淳拍案怒叱:“守备要造反吗?我奉朝廷之命治政办案,竟胆敢命令士兵劫持,目无上司、目无天子!”正气凛然的斥责,让黄镇中胆战心惊,连忙挥退士兵。最终,陶元淳顶住压力,将黄镇中治罪伏法。

崖州地处偏远,面对艰苦的环境、官场的陋习、豪强劣绅的威逼利诱,一位位良吏坚守初心:对百姓,公平正义,愿为苍生计;对自己,清廉自守,一身正气行走官场。

海南历史上“十大廉吏”之一的瞿罕在明代崇祯十二年出任崖州知州。这位来自湖广黄梅县的官员,上任伊始便“制订奖廉劾贪法章,布告衙门”,向贪腐吏胥宣战。

他录用官员,不徇亲疏远近,不凭个人好恶恩怨,也不唯利是图用庸人,而是广选贤能,优者录用,做到知人、用人、信人。在他执政后,为官者善政爱民,吏役不敢逞悍,社会风清气正。

四年后,瞿罕因积劳成疾卸任。离开时,他孤身单骑,打开唯一的随身木箱,请前来送别的百姓检查:“如有一物是从崖州带走的,听凭你们拿回去。”

令人动容的是,箱子里除官服、书籍和文房四宝外,无值钱之物,更无一物取自崖州。看到这种场景,崖州士民“祖饯百余里,各悲不自胜”。

清末崖州知州范云梯,用对联诠释了自己的为官初心,他在州衙张贴楹联:“在一日位,尽一日心,自我无私严执法,敢视机关为传舍”。这既是他的理念,更是他的行动准则。他坚守清廉本色,办学兴教全靠多方筹措,从不向百姓摊派;处理政务公正无私,不偏袒豪强,不欺压弱勢。

以教兴文 文脉永续

在历史长河中,一批心怀苍生、重视教化的官吏,以兴学为己任,用举措播撒文化火种,为崖州文脉注入绵延不绝的活力。

乾隆年间,崖州知州宋锦独具慧眼,将州城外的文昌庙改建为“珠崖书院”,为学子搭建求学之所。更难得的是,他自掏腰包捐献白银二百两,发起成立“义学”基金会,聘请教师授课,为书院奠定了最初的根基,立下开拓兴学的首功。

此后,多位官吏接力兴教,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,知州金绅募资修葺书院、完善设施并建立助学体系;道光八年(1828年),代理知州袁斯熊捐廉俸倡导重修;道光十年(1830年),知州齐元发将珠崖书院更名为“鳌山书院”,为这方文教阵地续命添力。

一代代官吏的接续耕耘,让崖州的教育火种越燃越旺,而清末的变革浪潮中,更有先行者勇于突破,为当地教育掀开全新篇章。

清末知州范云梯打破了崖州无公办学校的历史。任职期间,他先后创办了高等小学堂、初等小学堂、平民夜学堂、农学堂、工艺学堂和巡警学堂等六所公办学校,其中平民夜学堂专门吸收失学青年男女,由公家提供灯油、书籍和纸笔;工艺学堂则教授织布、造纸、藤竹编织等手艺,堪称早期的职业教育典范。

官吏们对崖州的贡献,不仅在于兴办学堂,播撒教育火种,更以笔墨为载体,留存地方文脉,为后世追溯崖州历史留下了珍贵瑰宝。

“可以说,如果没有一部如此厚重的《崖州志》,崖州的历史、三亚的昨天早已湮没在过往的时代风云中。”三亚文史工作者徐日霖曾在采访中满怀敬意地说,崖州知州张擢士在崖州十年,留给后人最大的功绩不在立德立功,而是组织编修了影响后世深远的《崖州志》。

在他之后,李如柏、钟元棣等诸多崖州官吏或搜集史料,或增补见闻,或校勘订正,为志书的完善倾注心力。让千年崖州的故事有迹可循,让后世得以透过文字触摸历史,这份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绵延不绝,以深厚底蕴滋养天涯大地。

山海流转,初心不改;千年回响,薪火相传。如今,这些名吏的故事,早已超越庙堂之上的功过记载,化作三亚土地上,鲜活的为民印记。在时光流转中,始终叩击人心,生生不息。